

如何奉献一部诗篇

□霍俊明

无论诗歌被业内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有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和无端指责,这就是诗人的“原罪”。诗歌噱头、娱乐事件、“不良”诗歌的新闻炒作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公信力。从“诗人的诗”及其场域来看,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诗刊、诗集、诗选、诗歌朗诵会、大型诗歌节、跨界诗歌的公益活动以及采风、研讨、颁奖等形形色色活动的频繁举办,另一方面却是诗歌刊物的销量不断走低,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自我窄化”的诸多不满,“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质疑之声犹在耳边。

自媒体语境下诗歌的新生态

移动平台自媒体的出现对诗歌生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歌是一束光”等数百个诗歌微信平台的出现,对诗歌的大众化、“流行化”以及审美的多元化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由此出现的诗歌传播、阅读和评价的新变化已引起关注。微信平台的诗歌更适合高速的城市生活和读屏式的阅读习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诗歌好像正在从圈子里的创作和阅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诗歌开始“流行”起来了。“诗人的诗”借助不断攀升的粉丝数和订阅数,似乎正在变为“大众的诗”。年末,《人民日报》专门谈论新媒体语境下“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的交互性对话和转换关系。较之精英化、学院化、小众化、知识化和圈子性的“诗人的诗”,自媒体平台上的“大众的诗”确实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以个人微信号为主体的诗歌传播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新媒体和大众传媒不同,而是更强调个人性和自由度。微信平台上流传最广的往往是朗诵诗、爱情诗和浪漫主义色彩鲜明、抒情性强的诗歌。尤其是那些抒写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的诗歌更容易迅速传播。与新的传播方式相应,是诗歌与影视、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的跨界传播。由此,出现了诗歌的剧场化、音乐化、广场化、公共化的新现象。此外还有诗歌专题纪录片和诗歌微电影。

一定程度上,诗歌借助自媒体平台在公共空间的传播有利于诗歌接受的大众化。但是,自由和开放的以个体为主导的自媒体很容易导致

2014年的中国诗歌一方面是“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另一方面却是诗歌刊物的销量不断走低,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自我窄化”的诸多不满,“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质疑之声犹在耳边。

信息泛滥和失衡。微信平台的诗歌传播也面临着危险,那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筛选、甄别和编辑机制而导致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比如对“废话体”、“口水诗”、“乌青体”、“脑残体”诗歌的不良传播)的现象。结果不是让人们离诗歌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远。诗歌的亲力和它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并不矛盾,它在受欢迎甚至在“流行”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来自日常却又高雅的诗意,对诗歌的阅读不能完全置于功利性的目的之上。自媒体平台同样应该营造一个健康的诗歌传播环境,让更多的人读到更多具有正能量的好诗,也让“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相互补充、彼此打开、平行发展。

诗人与校园:诗歌教育与普及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专门提到传统的诗歌和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是自新诗发轫以来,其传播大多局限于诗人和专业读者。以至于有人问,孔子倡导的“不学诗,无以言”的诗歌传统今天何以传承?还有人问,新诗产生100年了,为什么找不到一本属于孩子的诗集依然那么困难?新诗创作和阅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人的文化生活?

王小妮编选的《给孩子们的诗》、北岛编选的《给孩子的诗》,叶开主编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诗歌卷)的热销引发文学界和教育界对诗歌教育与普及问题的反思。适合儿童阅读的诗歌选本以及相应的新诗教育(北岛称之为“新诗蒙学”)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由此,一些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种诗歌选本、语文教材,企图重建文学教育。此外,诗人与校园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教育和大学校园文化的发展,比如对学生审美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提升,诗人与教

师、学生和批评家形成教学相长。此外,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实行驻校诗人制度,对提高大学生的诗歌素养有积极意义。同时,大学驻校诗人制度还应当向中小学校园推广,因为诗歌的普及还要从基础教育做起。

主旋律、正能量、中国梦

2014年内涌现出大量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高唱中国梦的诗作,主要集中于叙事长诗、长篇政治抒情诗以及组歌。

《诗刊》从2014年2月号开设“诗意中国梦”栏目,推出李瑛等老中青诗人讴歌时代、赞美生活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力作。2014年是中央政府援藏20周年,《诗刊》还推出专题“忠诚”,刊发援藏青年诗人陈人杰的组歌《极地放歌》,抒写西藏和援藏干部的艰苦生活,在真切抒写中国梦的同时通过组歌这种利于大众传播、接受的方式,让读者重新认知边关对人的挑战以及军人的强大精神和正能量的感染力。诗与歌的融合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接续了诗歌和音乐一体的传统。

本年度带有宏大叙事的诗歌在抒写重大主题和为人民抒怀的同时,在诗歌的构架、想象力、修辞和语言上较为讲究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突破。与此同时,同类题材的诗歌也存在着挖掘不深、空泛议论、浮夸抒情、缺乏生命体验的弊端。江苏少儿文化艺术促进会推出的“百首弘扬核心价值观新童谣”活动”以境融理、以事蕴德、以趣扬荣”的特点产生广泛影响。此外还有中华诗词学会推出的“中国梦”2014中华诗词演唱会、“天佑德杯中国梦”诗歌大赛等。

2014年度,以抗战为题材的主旋律诗歌以及以“中国梦·强军梦”为主题的军旅诗出现了可喜的态势。军旅诗歌如何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题

材和模式化的宏大历史叙事是其写作的难题。中青年军旅诗人对个人与民族、存在与死亡、当下生活和历史记忆的重新定位与思考使得这一类型的诗歌在呈现个体真实的同时也实现了想象的真实、军旅生活的真实以及历史的真实,在表现时代主旋律和宏大主题的同时携带着生命体温、情感热度、思想深度、人文情怀和社会观照。这些中青年军旅诗人在诗歌意境、思想纵深和诗歌美学方面也实现了一定的拓展。当然,军旅诗歌创作也出现了一些“短板”。军旅诗人刘立云在《铁马冰河人梦来》中指出,当下一些军旅诗歌缺乏锐气和担当,缺乏有写作难度和精神难度的、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撼动人心的大作品。

“诗歌与现实”的话题讨论持续升温

进入新世纪,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了挑战。深入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种种切实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引领诗歌写作的先声,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价值和诗学建设性。2014年“诗歌与现实”这一话题在整个文学场域中全面展开,相关评论从诗人的写作身份、姿态、历史意识、现实立场以及现实生活和新媒体的挑战强调了讲述中国故事的困窘和难度。诗人如何在场而又离场,如何本土而又世界,成为文学的美学问题,也成为重要的历史问题。

在第三届中国新诗论坛上,与会评论家就“诗歌与现实”的话题进行讨论。一部分学者认

从房间走向阳台

□张定浩

如今的新诗界,被不断重复的人名远远比能让人记住的诗行多得多,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诗人们的抱团取暖,另一方面也来自严肃批评家的退场。

随着自媒体的日益成熟,诗歌主要载体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气象,它使得韵律、节奏、语感,以及情绪上的明净,重新成为一些最需要重视的诗歌品质。

“时间……崇拜语言”,奥登说。作为一门以时间作为基本要素并凌驾其上的语言技艺,诗歌从本质上是拒绝按照年度来进行划分乃至评判的。因此,就某一年度为界限来考察诗歌,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也不过是从长河中随手取一瓢自饮。

小于和ABC

2014年秋天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段有关新诗的话,觉得特别好:“在现代传播业和大众媒体泛滥的时代,不断重复一些人的名字,意味着将这些人名临时经典化,还可能意味着稀奇古怪的荣誉地位和和市场利益,这与衡量一个真正诗人的标准相去甚远,对冀求能够深度体验作品的真正读者而言,也是无关紧要的。”(殷实:《新诗如何继续生长——对几份文学期刊诗歌作品的抽样观察》)如今的新诗界,被不断重复的人名远远比能让人记住的诗行要多得多,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一个新时代里诗人们的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却也来自严肃批评家的纷纷退场。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像李振声《季节轮换》那样细致恳切地面对当下诗歌现场的本土诗学著作,诗歌批评家要么退隐文学史中去,要么就在浮躁和寂寞中成为庞德建议抛弃的那类批评家——“我建议我们抛开所有使用模糊概括词语的批评家。不仅是那些因为太过无知而没办法拥有一种意思才使用模糊词语的,更包括那些使用模糊词语来掩盖他们的意思的,以及那样的一类批评家,他们使用的词语模糊到让读者可以认为他同意他们或赞成他们的主张,而其实却并非如此”。

诗歌翻译,作为汉语新诗的重要哺育,这些年一直都很热闹,2014年又有很多不错的译本出现,如程佳译(R.S.托马斯晚年诗选)、王家新译《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胡桑译《我曾这样寂寞生

活:辛波斯卡诗选2)、张芸译《宁静的激情:狄金森诗歌书信选》等。但相应的注重文本细读的诗论翻译一直都太少,以至于过去有段时间汉译本的海德格尔竟成了阅读现代诗的门户教材。而要准确感受一位其他语种的现代诗人,单靠原作和现有的翻译是徒劳的,靠半通不懂的诗化哲学汉译也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更踏实地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是诗人本人论诗的散文著述(如果有的话),以及借助另一位和他同语种诗人的眼睛和耳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愿意把布罗茨基《小于1》和埃兹拉·庞德《阅读ABC》这两部诗人文论的中译本出版,视为2014年度最为重要并且对新诗今后发展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因为每一个喜欢现代诗和普通读者,从此都可以借助这两部平实而有力的书,把它们作为试金石,自己去检验一首诗、一篇诗论,进而去检验自己对于诗歌的认识程度。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现代诗人,但他们对于现代诗的某些基本认识,比如对音律和节奏的强调,对古典素养的重视,对诗歌语言特质上的凝练、准确和新鲜的追求等等,却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他们很好地展示了什么叫做对于诗歌的严肃谈论,这种严肃谈论探讨的不是急功近利的题材设定、抽象空洞的理念情怀、廉价肤浅的政治指向,而是具体的、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关系,以及如作曲一般的微妙精细的调性变化。他们很好地展示了,诗人是一门语言赖以生存的人。

2014年文学期刊上的诗歌和前几年并无大异,它依旧是一种写作门槛和难度非常低的存在,这是相当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绵软无力的口语叙事腔,通入油滑的玄学表演腔,以及陈腐新揉的浪漫抒情腔,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缺乏“小于1”的自我认知和“ABC”的诗学教养,很多诗人的诗歌抱负和实际写作之间存在着落差。相对而言,今年《山花》上的诗歌品质似乎稍显突出一些,其中,孙文波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阿翔的《恣意诗》、朵渔的《危险的中年》组诗,都有让人眼前一亮之处。臧棣的《潜水史和预防针》,在气息上也比他那些不痛不痒的已书诗和协会诗要诚挚动人很多,也许正如他自己所写下的,“一个人同时走在两条路上,是可能的”。

站在青春的桥头

相对于诗歌江湖上的山头林立和好大喜功,校园诗歌以及围绕在校园周边的年轻诗人,一直是汉语诗坛上一种值得珍视的、相对清新和纯粹的存在。2014年,这种存在似乎尤为醒目。

在上海,4月份有“星从诗系”出版,收有胡桑《赋形者》、茱萸《仪式的焦虑》等六种,9月,复旦诗人肖水也出版诗集《文章》。和那些大学毕业后就匆匆卸笔的上一代校园诗人不同,这几位诗人有幸长年在学院里生活,或工作或读书,而这几本诗集也均是他们各自近10年以来自选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校园诗歌在写作者日趋成熟之后可能呈现出的新风貌。11月,《上海文学》杂志推出“新人群”专辑,刊发一批“90后”校园诗人的诗作,也颇可观。大体说来,他们的诗歌都比较讲

究字句的锤炼、意象的丰润,以及情绪上的沉静,肖水的《便利店》:“面包由如下成分组成:雪,沙砾,石头的嫩枝,适量带边锋的语言,朝两三点钟方向摇摆的梦。”吴兵的《午间土豆》:“细雨中沉默的人,生长出鹿角。”

而在北方,《诗刊》的下半月刊集中刊发年轻诗人作品,并组织锋芒毕露、坦诚相见的诗歌讨论会,显得颇有生气,比如从治辰在针对戴维娜作品的研讨会上就直言不讳,“我们这一票人可能都背离了诗歌技艺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准确。表演性的东西占了上风,看起来丰富,但恰恰失去了准确”。我想,这种准确可能会包括很多具体指向,但最终都会落在用词的准确上,而正是这些准确的用词,才使得一个诗人有可能区别于另一个诗人。在批量化生产、同质化严重的诗歌现场,这样对于“准确”的反省弥足珍贵。9月,第30届青春诗会召开,随之出版了15种青年诗人的诗集。10月,北京的一些年轻诗人策划举办了主题为“桥与门”的北京青年诗会,他们明确地宣称,“今天在北京从事写作的诗人,我们惊叹于他们的创造能力和生产规模,这里并非冷清寂寥,而是写出的作品太多了。我们宁可诗人少写一点,多想一点。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提出‘一次性’的概念,把每一次写作都当作第一次,把每一次写作也都当作最后一次”。这是新一代写诗者的清醒和抱负。

就诗风而言,北方的年轻诗人烟火气似乎更浓烈一些,句法上也显得更加放纵多变。比如李宏伟的《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有些男人试图拧紧你的发条,有些则要免费你的肉身,你一面挡住绝望,一面对撞上来的废墟传神写照、随物赋形。”黄茜的《室内乐》:“它们结伴而来,抽象的弧线的系列,饱满的光的花序,浪花里缠斗的健硕的孩子”。

才学兼备的新气象

严羽《沧浪诗话》里有名的句子:“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有很多诗人常会津津于此,却忘了这只是原文里的半截话,后面还有半截话作为补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此得力于后天者,学力也。非才无以学,非学无以运才,两者均不可废。有才而无学,是绝代佳人唱《莲花落》也;有学而无才,是长安乞儿着官锦袍也。”一种重才轻学的空疏倾向,曾长久笼罩诗坛,以至于有些年轻一点的新诗作者,直到如今对于古典依旧存在一种源自无知的极其轻薄的态度和大而无当的傲慢。他们对于古典诗和古典诗人的谈论,每每令人喷饭。

但这种状况近年来也正在逐步好转。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自觉地向着中西古典传统深入,而不仅仅满足于拿着屈原、陶渊明、杜甫发发诗兴。限于篇幅,我在这里抱歉只能挂一漏万地略提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王伟,一个是上海的朱缙。

2014年,王伟开始撰写诗论随笔集《近代作者》,计划对拜伦、海涅、莱蒙托夫、普希金等十余位19世纪诗人进行重读和评述,从已经问世的几篇来看,结合他们自己的长诗和诗剧实践,他正在



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写作谱系,同时也正在呈现出更为强力的综合作者的自我形象。如他在《大陆桥未来史·献辞》中所说:“于是我仿佛被迫停止工作的人/整理故我的历史。”/在冻土与军管各省/安扎语言营帐,它将包含/几种粗率的样式:/对话、叙事诗和散文。”

与田野工作出身的王伟所具有的强烈实践感相比,在上海高校教书的朱缙走的是博古通今的趣味书斋之路。他真正令我吃惊之处,是他的那些尚未完成的诗经今译。2014年他自印《一个人的诗经2》,收入《国风·召南》的今译14篇,在那些诗里面,源自古典的绵绵深意,转化成一种强劲新鲜的现代汉语语感,如《召南·草虫》:“去往南山只是一个借口/我顺手摘下蕨和蕨的叶子/草丛不再奏鸣,草虫/都停下来看我。”

朝向未知

尽管诸如“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这样的微信公众号2013年就开始出现,但真正的微信诗歌热可以说是从2014年开始的。除了上述两家更加火热外,“中国诗歌学会”

为,诗歌不能硬性而直接地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发生关系,而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在第四届中国诗歌节诗歌论坛上,来自大陆以及港澳地区的诗人和评论家紧紧围绕“梦想与现实”这一主题讨论新的历史条件下诗歌与当下和现实的关系,诗歌如何反映时代、承担现实、深入生活。第八届天问诗歌艺术节以“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为主题,研讨当下的诗歌生态、诗人面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此外,诗学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当代诗坛“刀锋”透视》《自由的诗》都对诗歌与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思辨和现象分析。欧阳江河认为,诗歌不应该像其他“媒体写作”一样被文化和现实、市场等消费而成为“风格化景观”,应该具有痛感、尖锐性和现实性,应该对时代做出更复杂的观照,诗歌写作应该有宽广性和深度。吉狄马加在《诗歌在当下现实中的作用与诗人的使命》中认为,全球化时代语境下,诗人担负着建设人类精神家园、抚慰人类干枯绝望心灵的重要作用和使命,诗人是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应该做一个行动的诗人。

在关注新近诗歌写作与现实关系的同时,诗歌理论和批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诗评价体系 and 评价标准如何能够取得公信力和大众共识度的问题。当下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是乡村写作和城市写作的等量齐观,关注现实题材的诗歌大量涌现,并引起社会广泛的认知度,但也因为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理解和诗歌的转化能力而导致类型、平面和浮泛。另一方面是诗歌批评和理论研究的自说自话,缺乏对当下诗歌写作现象的深入透彻的梳理、反思和总结,空泛地谈论诗歌美学,套用西方文论,对诗歌历史的掉书袋式的研究。2014年突然辞世的陈超的最后一本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强调,诗歌研究应该对现实问题予以关注和介入。在陈超看来,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一样都应该介入当代、介入当下的“噤心主题”,而深入当代和介入当下的方法则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



是2014年涌现出来的诗歌公众号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另外一些个人凭兴趣开设的诗歌公号如“红杏出墙人民艺术广播”,或语音或文字,定期推送他们喜欢的诗人诗作、译诗及相关诗论,在品质上也远胜于传统诗报刊物和大多数民刊。随着微博、微信、豆瓣乃至荔枝电台等自媒体的形成和日益成熟,诗歌主要载体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气象,它使得韵律、节奏、语感,以及情绪上的明净,重新成为一些最需要重视的诗歌品质。诗歌,开始重新意味着一首首具体的、依靠文本自身在口耳和手指间流转的诗,而不是局限在小圈子里面的自娱自乐。诗人们仿佛正慢慢地尝试要从私密的小房间里偶尔走出来,但并不是要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回到广场,而是走到朝向街道的阳台上。无论对于诗人还是对于诗歌本身,这都会是一个有益的空间,因为其中蕴藏着未知和考验。

每年都有一些诗人离开我们,走向更广袤的时间。也许我们还应该谈一谈他们。但对诗人而言,死亡其实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或许没有必要那么心急地给他们盖上封印,仿佛要赶在新年到来前甩掉他们。